

为他人做嫁衣

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

周颖如 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为他人做嫁衣

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

周颖如 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他人做嫁衣——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 / 周颖如著.

——北京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2011.4

ISBN 978-7-5100-3434-3

I. ①为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编辑工作-文集 IV. ①G23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1983号

为他人做嫁衣——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

著者:周颖如

出版统筹:吴兴元

筹划出版:银杏树下

责任编辑:方理

营销推广:ONEBOOK

装帧制造:墨白空间

出版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出版人:张跃明

发行: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(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-6401-3086)

销售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昌平区百善镇东沙屯466号 邮编102206)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3.75 插页4

字数:79千

版次:2011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教师服务:teacher@hinabook.com 139-1140-1220

读者咨询:onebook@263.net

营销咨询:133-6657-3072

编辑咨询:133-6631-2326

ISBN 978-7-5100-3434-3/C·148

定价:22.80元

(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、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10-61732313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本书作者周颖如女士,是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的编审。

周女士 194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,主修英美文学。1949—1956 年被调进中苏友好协会总会《中苏友好》杂志任编辑,所学英文用不上,后来只好进夜校学俄文。经一年余的突击学习,周女士粗通俄文,能筛选俄文资料,为《中苏友好报》编译文章。1956 年调入中宣部《学习译丛》编辑部,从事英、俄文理论文章翻译。1959 年调入 1958 年后刚恢复业务的商务印书馆,从事外国史译稿的编辑加工工作,直到 1991 年底离休。1984 年周女士还曾被外交部借调,赴日内瓦工作,任联合国裁军会议文件审校,职务是专家最高级 (professional 4)。回国后,同年被选为英国史学会理事。2002 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。

周女士在商务印书馆共 32 年,但实际做编辑工作的时间可能连 20 年都不到。年轻读者有所不知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,无休止的政治运动、政治学习、上山下乡劳动、长期停产搞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、去五七干校劳动“改造”,等等,造成编辑出版业务实际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。虽然真正从事业务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,但经她手组译、审校出版的史学名著甚丰,计 40 余部,2000 万字左右。如

《罗马史》、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、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、《光荣与梦想》等(详见本书)。

周女士的译作(独译或合译),主要有《通向珍珠港之路》、《林肯传》、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》、《新史学》(2009年版)、《现代世界史》、《思想自由史》(即将出版)、《南斯拉夫与新共产主义》、《托派第四国际》、《革命的哲学》等;著作有《彼得大帝》(属于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)。

作为编审,周女士的业绩在诸多同事中是比较突出的。她发稿量大,编辑加工的译稿质量高。分析原因,首先是,她对出版物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心中总装着“对读者负责”的想法。“甘心情愿为他人做嫁衣”,是出版界的一句铭言。当时在书的版权页上是不署编辑名字的,编辑需不计名利,甘心做个无名英雄。有了这种精神,那么为提高译稿质量所需的方法、手段,勤奋、钻研精神都会派生出来。笔者是周女士的同事,同是1959年进入商务,因此对她有所了解。

周女士在本书中着重谈的,是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加工史学名著译稿的经历、经验和体会。她认为,一个胜任译稿编辑加工的编辑,不仅要有关外文和中文有一定的修养,还必须具备有关专业知识。同时知识面一定要广,懂些杂学,善于查考各种参考书、工具书。但个人的知识毕竟有限,编辑必须具备虚心请教的态度,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,除了就近请教本社的有关专家,还应向学术界学者专家求教,帮助解决疑难。

周女士主张,译稿编辑自己也应练笔作些翻译,尽量多取得些翻译技巧等经验,以利于审校译稿。周女士在工作后期作有一些审稿笔记,本书有一半篇幅举了不少生动例子谈翻译问题,都会留给读者以深刻印象。读周女士的经验谈,一定会获

益匪浅;借鉴周女士的经验,在工作中一定可以少走弯路。

周女士在工作回忆部分,专写了一节来颂扬 1958 年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编的陈翰伯先生。1958 年后,由于陈翰伯先生才华出众的领导,为推进商务文化出版事业投入的全部精力,从不为个人追名逐利、却为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付出的大量心血,商务的出版事业得以复兴和发展。在商务工作的人,对他均有口皆碑。陈翰伯先生对商务、对整个出版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,必将名垂青史。

吴衡康,原商务印书馆经济编辑室主任

2011 年 4 月

目 录

序	吴衡康 1
上篇 编辑	1
1 出版社是个大学校	3
2 怀念我们的老总编陈翰伯同志	9
3 我在历史编辑室的工作	16
4 与译者交朋友	21
5 几部书稿的编辑小记	30
6 “文革”后期出版社头头们怎样看待 译稿编辑工作	40
下篇 翻译	45
1 从事译稿编辑工作的体会	47
2 正确理解英语词义	57
3 语法分析有助于正确理解原文	70
4 也谈译文的信、达、雅	83
5 历史著作翻译中的文化、背景知识	92
后记	109
编后记	111

1 出版社是个大学校

在改革开放以前,每本书的责任编辑是不署名的。我们只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,既无名,也无利,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。有一位青年朋友问我:“你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,不觉得枯燥吗?”他问得好,我回顾自己的编辑生涯,有苦有乐。由不懂得工作到学会工作,到热爱工作,甚至变成工作狂,我是热爱我的编辑工作的,并不觉得枯燥。

1949年,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,被分配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工作。我的第一外语是英文,第二外语是法文,但到了中苏友好协会后,却发现没有用武之地。《中苏友好》杂志需要的是俄文翻译,我学的语言根本用不上,只能做些打杂的助理编辑工作。我想申请调动工作,但那时候要调动工作是难上加难,搞不好还要被批判为“不安心革命工作”、“个人主义”。我闹了一段情绪,也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俄文夜校学俄文。初办的俄文夜校教师阵容很强,当时的俄文权威刘泽荣、北大的俄文教授李绍鹏亲自授课。我学了一年多俄文后,在做完助理编辑工作之余,开始练习简短的俄文翻译,请俄文专业毕业的同事帮助修改。约过了两年,《中苏友好》杂志改成小型的《中苏友好报》,我分工负责共产主义教育版,需要大量翻阅有关的俄文杂志,查找适用的文章编译。我先后编译了百把篇短小的文章,对工作也慢慢培养出兴趣。

然而,1954年前后,我因香港家庭受到莫须有的“特嫌”的政治怀疑,连这点编译工作也不让我做了。我被调离编辑部,转到资料室做俄文书籍的编目工作。1955年批判胡风“反革命集团”,开始时号召我们联系思想、自我分析批判,但后来却突然转为肃反运动,我受到突如其来的追逼、批判斗争。1956年审查终于有了结论,“未发现有什么政治问题”。上级党委副书记表示了歉意。当时适逢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,社会上人事调动稍有松动,“学非所用”的可申请归队,我就申请调做与英文有关的工作。1956年冬,我被调入中宣部《学习译丛》编辑部,总算开始做点英文理论文章的翻译工作,也译点俄文文章。英文我已丢生了六七年,开始翻译时的水平也不高。幸好英文组的组长杨熙龄人很好,不但翻译经验丰富,中英文水平高,而且待人热情,肯热心帮助新人,让我受益良多。我征得他的同意,把每次经他校改的译文都拿回来认真看一遍,对照自己的译文,琢磨译错和表达欠佳的原因,翻译水平逐渐有所提高。可惜好景不长,1958年,我被下放到河北省定县劳动锻炼。

经过一年又一个月,劳动锻炼结束了。这时《学习译丛》编辑部已转到社会科学院,中宣部党委负责人事分配的同志告诉我,原宣传处副处长、《学习》杂志主编陈翰伯同志已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,他那里需要英文人才,问我愿不愿去。出版社是搞具体业务的,我表示愿意。就这样,从1959年2月起,我就调入商务印书馆了。此后,我一直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外国史译稿的编辑加工工作,直到1991年底离休。

当时,商务印书馆有三个编辑室。第一编辑室的任务是出版中文读物和工具书,第二编辑室出版外文读物和工具书,第三编辑室出版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。我被分到三编室,陈翰

伯向我介绍,三编室内分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等组(60年代后改为各编辑室),问我愿意上哪个组。我想我一向对政治、经济、哲学理论不感兴趣,只有历史多少与我以前所学的外国文学有点接近,而且我的丈夫在北大也是教世界史的,我有问题可以问他,所以选择了历史组。

实际上,我除了中学、大学学过一点点关于外国历史的极其粗浅的皮毛知识外,对世界各国历史相当无知。初到三编室,室主任就塞给我一部英国史的译稿。他并没有告诉我怎么校订加工,只说发现译文有错就改正。也许他认为我1949年就毕业参加工作,已有十年工作经验,水平应该不低了。他哪知道,这十年中,我的英文荒废了八九年,很少有机会在大学学到的那点基础上继续提高,对于译稿的编辑工作更是个门外汉。一开始,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,但我必须刻苦努力,克服困难,在干中学。我一方面主动虚心向老编辑请教;另一方面,出版社有的是各种中外文工具书、参考书,我看稿时有疑难就积极向它们求教求解,它们成为我的第一批老师。有些译稿的译文水平较高,我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,也留心学习译者们的技巧与方法。有些译稿的译文生硬晦涩或有错误,我便依靠工具书的帮助,把句子改得更确切、更通顺易懂。这样,在校订加工译稿的过程中,我自己也得到提高。再结合业余时间搞点翻译,我的翻译水平于是点点滴滴地得到长进。

但是,我这个人缺点很多,尤其在年轻时更是粗枝大叶。这是做编辑工作的大忌。大约在我进商务后一年,1960年,室主任交给我一份试译稿,要我写出审稿意见。这是我第一次审试译稿,我勉为其难地审了,有一处,我把一个句子的标点看错了,写出的意见当然也错了。本来我审完后应该经副

主任复审,但编辑室却没有复审就直接退给译者了。这位译者大概是有一些翻译经验的,他发现我的意见中有错误,大发雷霆,来信狠狠地批评了我们。室主任本人就是一位高水平的老译者,他就此事召开了全编辑室大会,对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,批评我工作不够认真细致,对译者态度不够谦虚尊重等等。我记得我当时被批评得掉泪了。我既为自己工作出了差错感到痛心、歉疚,又为被当众批评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事后冷静想想,这次挨批其实是好事,给我当头一棒,使我对自己的缺点保持警醒。此后,我接受教训,工作变得较为认真细致。在审稿工作中,我除了仔细读懂原文外,对译文也多作推敲,提出的意见也不敢绝对化,持与译者商量的态度,遇到自己处理不好的文字,就多查,多向别人请教。我感谢室主任给我敲了警钟。

在当时的条件下,历史书稿的译者大部分并非专业研究者,有时因缺乏专业知识,把个别句子译得牛头不对马嘴。而历史编辑室的编辑也大都缺乏相关知识背景,对历史不具有足够的了解。我通过“摸门牌号码”,查考有关专业工具书、参考书,尽量减少书稿中出现的专业性错误,也从中学到一些历史知识。但是,外国历史书稿中,天文地理无所不包,涉及各个学科领域,由于个人知识水平的局限性,常有些问题找不到查考线索,无法解决。遇到这种情况,我不敢不懂装懂,瞎改稿,就经常向经验丰富的老编辑或相关专业毕业的编辑请教,他们都是我现成的老师。有的老编辑还教我如何使用工具书,指导我今后如何自己检索问题,或帮助我解决某些名词术语的译法。有时还会碰到其他语种文字,例如法文、西班牙文、德文、日文等,除了法文我可自己解决外,其他语种则向外语编辑室有关编辑请教解决。

出版社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制订新的出书规划。我在参与过程中,感到茫茫书海、无从下手,也不了解学术界的需求,于是就向有关专家学者或登门求教,或发信征求意见。但学术界人士观点也不尽相同,各有侧重。经过与他们的反复求教磋商,我终于对有关专业的重要著作、外国著名学者有了个大体了解。编辑室得以根据学界的需要与自身状况,对选题排出轻重缓急,制订初步的出书规划。有时,当我在书稿上遇到专业疑难问题,问遍社内老编辑和查考工具书、参考书皆不能解决时,我也常登门向一些教授求教,尊他们为师。这些老教授都非常热情、乐于助人,往往不辞辛苦,给我解疑释难,分析问题的历史背景、实质、来龙去脉,或帮助查找资料。我在处理《中国伊朗篇》、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、《阿古柏伯克传》、《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》等书稿时,就曾向邵循正、齐思和、张广达、威国淦诸先生求教,并得到他们慷慨的帮助。

“文革”前,商务印书馆校对科的不少老校对都具有大学水平,且有多年工作经验。他们校对校样非常仔细,不仅核对原稿,而且常能发现我们在看稿过程中粗心放过的文字差错,甚至不合逻辑的词语表达,以及前后不统一的各种问题,在校样上一一提出疑问,让我们解决。他们帮助责任编辑在书稿变成书、与读者见面之前尽量消灭差错,也教会了我后来在看稿或看校样时更加关注易出错的地方。我对他们一直充满感激之情。

作为一名编辑,我就是在这众多老师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。回顾起来,出版社也是个大学校,只要有心学、虚心学,个人在工作上总会有所提高。只可惜,也许因长期工作紧张,也许因个人不善于思考总结、工作方法有问题,我很少有时间结

合业务比较系统地学习、整理和研究问题。而工作的性质(要关照的方面太多、一发现问题就要停下来作各种查改、不可能一气呵成等等),使我很难对书稿形成完整、系统的概念。所以,我即使有所提高,也是有限的。我未能成为一位编辑家,而只是个编辑匠。

2 怀念我们的老总编陈翰伯同志

1966年6月,在河南安阳和林县搞“四清”运动的商务印书馆的大批编辑和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命令,全部撤回北京,说是要参加运动。到达北京,刚下火车,来接我们的总编室秘书就凑近我耳边悄悄告诉我:“陈翰伯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!”一位那么好的领导同志怎么突然成了“走资派”?我脑子“嗡”地一下,转不过弯来!我不能理解,感到十分困惑,但又不敢问、无从问,难以接受,又不得不接受。陈翰伯同志在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,横遭批斗。我们这些曾受到他培育教导的人,也不得不违心地举手跟着喊打倒他的口号。这些年想起,内心总感到歉疚不已。

陈翰伯同志(1914—1988)把一生奉献给党的新闻出版事业。正如他自己在简略的自传中所说的,“青春办报,皓首出书”。解放前,他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办报,以“梅碧华”等笔名写了不少文章,不但在新闻战线上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,而且广交朋友,培育了不少人才。解放初期,他调入新华社,率先办了几期新闻、宣传干部培训班,为党培养了大批新闻、宣传战线骨干人才。后来调入中宣部任宣传处副处长,主编过《学习》杂志。1958年他奉调到商务印书馆,任总编辑兼总经理(1958—1970)。

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老的出版社,成立于1897年,曾经在

出版事业上有辉煌的历史。但在 1949 年以后,由于种种原因,业务紧缩。公私合营后,1954 年商务印书馆迁京,并入高教出版社。50 年代后期,国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,开始开展整理和翻译中、外文化遗产的工作,上级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规划,决定恢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块老牌子,分工承担这两个任务。商务负责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,编辑出版中外文辞书。

陈翰伯同志接手后,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,广泛联系学术界,着手制订出版规划,罗致人才,提高老中青编辑对这一工作的认识,注重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。他尤其关心和培养新从高校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编辑,使商务的编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,业务蒸蒸日上。商务印书馆得到复兴,为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也为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至今,我们当年在陈翰伯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老同事们在一起谈起他时,总是怀着敬爱和怀念的心情。我是 1959 年调入商务的,作为一个普通编辑,跟他接触不算特别多,但感到自己虽然从事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,却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像陈翰伯同志这样,把全部精力投在商务印书馆以至整个出版事业上,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,只知奉献、从不索取的领导。以下是我的点滴回忆。

陈翰伯同志在重新组建商务之际,就已着眼于如何开拓商务的编辑出版业务。他认为编辑队伍的提高和壮大是开展业务的当务之急。首先,他可能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业务了解不深,而编辑们知之更少,就号召并带头学习“四史”,即世界通史、西方哲学史、经济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。在他的带动和提倡下,各编辑室和组的编辑们也根据自己的分工范围选学一门专史,这样就能对所分工的业务范围和背景知识有个大致的了

解。按陈翰伯同志的说法,这叫做“便于摸门牌号码”,有利于引导编辑们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,了解原著和作者的背景情况,从而解决问题。

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要处理大量的书稿,但编辑的水平不见得比译者高。陈翰伯同志除了号召学“四史”外,还非常关心编辑们的政治思想、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。编辑往往易于只埋头业务,他常提醒我们要“抬头走路”。他不但自己常给我们作政治、时事形势和如何对待出书工作的报告,还经常请外面的学者、专家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,其中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学者、掌管宣传工作的官员,也有出版界的老专家、老前辈……这些报告既有助于我们对书稿中的政治、是非问题初步作出判断,又使我们从老前辈、老专家多年工作的心得和经验之中得益匪浅,提高和改进了业务能力。陈翰伯同志还常提倡我们在业余时间自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。有一段时期,他要我们每星期填交一份读报表,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填写,然后大家传阅,互相交流,促进学习。

陈翰伯同志也号召我们注意练笔。60年代初期,“极左”的思想已越来越浓,业余搞翻译被视为“搞自撙”,一般不提倡。但当时商务开始编辑出版吴晗主编的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,陈翰伯同志就建议大家认个选题练练笔,有几位编辑响应号召认了个选题。小丛书一本只有两万字左右,但既然认了选题,就必须围绕该选题的内容和主题查阅大量资料,反复构思,反复修改,直到通过被采用。这是名副其实的练笔,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。

陈翰伯同志尤其关心和培养新从高校毕业分来的青年编辑。他专门将他们组成一个翻译小组,每个人练习翻译一本书;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当老师,一对一地指导,并最后校